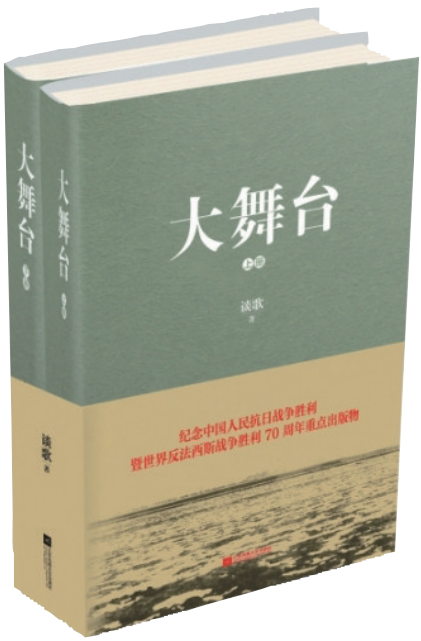


■新作聚焦

谈歌长篇小说《大舞台》： 不同流俗的“特工”小说

□郝雨



谈歌的长篇小说《大舞台》创造了一种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“网络评书体”。故事的叙述始终有一个故事之外全知全能式的说书人,且大量吸纳了网络思维和网络用语。

在艺术内涵方面,小说表现了“人生就是一座大舞台”,极广阔地展示了社会众生相,形象描绘了人生百态,深刻揭示了人生最本真的意涵。

谈歌最新的长篇小说《大舞台》(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)从抗战前夕我党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开始写起,一直写到解放战争胜利之后。故事以“梅记杂戏社”的兴衰沿革为依托,讲述了身怀绝技的“梅记杂戏社”班主、共产党员梅三娘与她的女儿梅立春、梅天凤、梅可心等人,以梅记杂戏社为舞台,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,两代人前仆后继,与日寇周旋英勇抗争的故事。围绕梅三娘母女,小说还塑造了赵元初、徐飞扬、付浩声、萧家广、唐行等一批身份各异、性格丰满、有血有肉的抗日英雄群像,他们身世迥别,五行八作,甚至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,然而,在民族危亡的时刻,怀抱保家卫国共同的理想,他们走到了“抗战”这面大旗下,或壮烈舍生取义,或机智与敌周旋,生动而立体地展现了抗战斗争的复杂与残酷。在谈歌笔下,“抗战”不再是一个宏大而遥远的词汇,用多角度、多层次的笔触,将读者带入那个铁血的年代,带入街巷里弄的日常细节,一个斗争时代变得空前具体鲜活,令人叹为观止。

在小说中,谈歌创造了一种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表现形式,我称之为“网络评书体”。在艺术内涵方面,小说极广阔地展示了社会众生相,形象描绘了人生百态,深刻揭示了人生最本真的意涵。

新世纪以来,小说文体方面的探索越来越走向多元。但就总的趋势而言,比较倾向于民族化、大众化和回归传统。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还原继承,而大都是在网络时代和

电子技术条件的基础上,吸收并改造传统形式和表现方法,如传奇体、神魔体、穿越体、玄幻体、话本体、言情体等,再充分加入现代元素,进一步创造一种新型文体。谈歌主要采用的是我国北方比较流行的评书体。其中最突出的是,故事的叙述始终有一个故事之外全知全能式的说书人,而且在小说中这个说书人就一直贯穿作品始终的作家“谈歌”,小说的语气也始终是作者的轻松诉说、侃侃而谈。这些都是传统评书惯用手法。

同时,作者在小说结构和语言风格上全面吸纳网络思维和网络用语。小说的整体布局不再是传统线性的章回结构,而是网状的,把大故事切碎分配给一个个物,每一节中的核心人物拎起一些小故事,时间是交错和交互式的。小说以众多人物为点,发散铺陈,立体多维,收放有度,属于真正的网络化的思维结构。

此外,谈歌还采用了穿越时空的叙述与评述。这种穿越是《文心雕龙》所倡导的“思接千载,视通万里”,是“说书人”的深思穿越,在小说的特定环节和场景中,自然而然地引发感慨,评古论今。例如:“写到这里,谈歌顿生感慨:人们往往好奇,某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?唉!事情就像链条,事情越复杂环节越多,张三引发李四,李四引发王五,王五引发……且不说重大的决定能够决定人的一生,但凡琐碎而细小的决定,即一些看似不经意,或随机性的选择,比如去哪儿吃饭、去哪条街、不期遇到了谁、找谁聊天儿、聊了多一会儿,种种,往往改变的不止是你这一天,而是你全部的人生。”这样评头论足式的画外音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,并不影响故事的完整和连贯。

作为说书人的“谈歌”每跳出故事评头论足的那些插话,更是把网络用语都用到家了:“点赞”、“艾玛”、“任性”、“蛮拼”、“喜大普奔”、“人艰不拆”、“不明觉厉”、“累觉不爱”等网络流行语在小说中信手拈来。当然这样的用语也需要恰到好处,不能刻意而为、弄巧成拙、以词害意。

小说的艺术内涵可以概括为“人生全景图”。小说人物众多,身份多种多样、形形色色,普遍触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。在这部百余万字的超长篇小说中,谈歌特意在小说题目下面加了一个副题“特工风云十三年”。谈歌的这部“特工”小说完全不同流俗,其中充满了世俗人生。即使是那些高级特工人员以及袁世凯、张作霖等军政要员,也处处和普通的市井生活紧密联系。

小说中最典型的是一号人物赵元初:赵元初,字义明,直隶大城人,光绪十六年生。赵元初曾自话自说,他家上溯几代,都是穷人,传到他父亲赵玉清一代,光景更不济,破房有两间,地却无一垅。赵元初5岁时,老娘见背,其父盼梨生辍角,送去私塾,只两年,便无力供学。又

送去学杂役。一直到30岁,混迹江湖,勉强糊口。后诸多偶然,时来运转,一路高升。官至保定警备司令。而且在这过程中,虽然事业发达,却一再婚姻不幸,几任老婆都背叛他而去。而他一直爱着的女人,又总是不能如愿。这样的一个人物,让读者看到的并不只是他经历的离奇故事,而是从中体味到整个人生的苦辣酸甜,甚至凄风苦雨、惊涛骇浪。

当然,谈歌小说的“人生全景图”并不只是通过人物丰富曲折的人生故事来体现。即使是次要的人物,他也尽量通过个性化的描写,表现出人生意味的某个角落和侧面。如:钱如雪这女人长得俏丽妖冶,为人处世却刁钻刻薄,总是有一种战无不胜的霸主心态。她广交际,善联络,在外行圈子里人缘很好,有女中丈夫的美誉。但在业内,她的人缘却极“坏”。什么原因?她太好斗,大家都有点儿惧怕。最关键的是,钱如雪与保定地方行政长官多有来往,有了这层关系,更是无人敢惹她了。通过如此三言两语的描述,谈歌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一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。

谈歌把小说题目定为《大舞台》,并有题记摆明了就是表现“人生就是一座大舞台”,其中不仅人人都在充当“生旦净末丑”,而且人人“唱念做打”、“辗转腾挪”,但终究只是“匆匆过客”。千万不要轻视这样的几句破题之词,它让我联想到的是《三国演义》中引用的那个杨慎《廿一史弹词》开场词《临江仙》: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”,“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。”谈歌破题虽然没有那么雄浑

悲壮,却也通过戏剧舞台上的各种基本功,看似轻描淡写,实则意味深长。

在如今这个文化碎片化、媒体泡沫化时代,读者如何能够耐心读完一部百万余字的超级大长篇,可读性是一个致命问题。谈歌的小说语言诙谐幽默,人物个性鲜明突出。从举止作风到言语表达,都能让人感到人物的形象立体,有血有肉。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方式。谈歌小说的好看,因为其中有很多奇人奇事。如神偷侠盗“来无影”、神龙见首不见尾的“乌有道长”、武功独步天下的梅三娘……尤其让我耳目一新的的是里面写到的“城匪”。黑社会和青红帮之类旧时代现象屡见不鲜,城匪还真是头一次听说。城匪是伴随中国城市近代进程,应运而生的一种底层社会力量,是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变化而出现的一种反政府的城市民间自发武装。城匪不似土匪那样明目张胆地聚啸山林、打家劫舍,其特点多是隐藏在城市的商业市场中,并不彰显。有城匪身份的人,大都有自己的营生,一旦有“活儿”,他们会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情,迅速按时到某地集合行动。事后,便有人主持利润分配。在谈歌这部小说中,城匪的表现可是不同凡响。确实让人开眼。

所谓小说的“人生全景图”,不仅需要社会空间的宽阔,也需要历时时间的纵深。其实,更少不了思想精神的博大。谈歌这部小说纵横百年历史,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段历史,小说对其中的战争和磨难表现得雄浑大气。尤其是结尾处的一段议论,更让人感到震撼:时间从来不是神话,时间的“前”与“后”,“新”与“旧”,也不是价值判断,更不是“奉天承运”的什么东西。“那”时间与“这”时间,从无法定的传承关系。沉湎于这时间的年轻人,几乎没有人想当英雄,英雄已经成为一个沾满了历史灰尘,过气了老土了的代名词。人们驱逐了高尚,容纳了恶俗。放眼去看,世人多无耻,何谈敬畏之心?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世间,总会有豪情天纵的故事亮如星辰,虽然明灭不定,但是它们在某一个特殊年代放射出情有独钟的光芒,足以照耀千古。谈歌直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要害,感情充沛,振聋发聩。



越走越远的秦岭

□杨惠显

中国近代史上的灾难不计其数,可是,几百年过后,一百年过后,几十年过后,我们的作家们又是怎样的态度呢?文学史里的空白有多大,答案就有多大。

如今有一种现象其实是很奇怪的。人们论创作,似乎都在讲靠近现实、立足当下,却忽视了最终将被历史一网打尽的宿命和教训。姑且不提短短几十年内十七年文学、“文革”文学、新时期文学、新世纪文学一浪滔天一浪的怪相,即便是近十几年、近几年的文坛,也在标新立异轮番打擂,而所谓的杀手锏,多是社会现象的描摹和情绪的宣泄,筋疲力尽之后,又不得不横向西方向前沿、纵向中国百年前寻找文学的真经。秦岭可贵的一点,就是不买这笔糊涂账,他的《借命时代的家乡》是一篇将历史和现实链接得严丝合缝的小说佳作,也是一篇在追风流俗的时代容易被误读、被低估、被断章取义的小说。小说讲述了改革开放时代西部干旱地区的农村青年董建泉与市场、权力、婚姻、家庭、传统伦理既抗争又妥协的悲壮而复杂的心灵史。在主人公身上,我们能隐隐看到《创业史》《人生》中梁生宝、高加林影子,但本质上又是一个全新的、更加复杂的农民形象。作者巧妙地跳出认识历史的局限,在物欲世界与传统宗教观念交锋的巅峰上,把人物的历史背影投放得很远,有历史的追溯感。只要我们承认现实的复杂性,承认这个时代农民活着的难度,我们就会发现,这个小说里,灵魂的救赎感人肺腑,历史的反思直指大地。我们看到的农民,既是时代的农民,也是历史的农民。

《大舞台》原来的书名叫《那时间》,主要想写写“那个时间里”发生的特工故事,弘扬一种“那时间”精神上的正大能量。原来《后记》对书名有个解释:“时间从来不是神话,时间的‘前’与‘后’,‘新’与‘旧’,也不是价值判断,更不是‘奉天承运’的什么东西。‘那’时间与‘这’时间,从无法定的传承关系”。

后来朋友说,书名太虚了点儿,建议改成《大舞台》。听人劝,吃饱饭。于是,《那时间》改成了《大舞台》。于是,上边这段话也删掉了。

说起来不大好意思,《大舞台》这本小说源于喝酒。我爱喝酒。人以类聚,我有一帮酒友。职业成分么,形形色色,干什么的都有。或脑力或体力,总之都是劳动者。

劳动么,都有各自的生活感慨,往往是,一喝就多,一多就说,一说就是“过山车”。

2009年春节过后,几个爱看书的酒友聚在一起,话题不知道怎么就扯到电视剧了,我说,总感觉时下电视剧里的特工人物不大真实。有人说你写写特工吧,这个题材人们爱看;有人说你写国共两党的特工,应该很好看,写得生活化一些;有人说,你书看得杂,这方面肯定有积累……

积累,我倒是有的一些,那些年,因给几部谍战剧改剧本,我刻意读过一些关于特工生活方面的书,也注意做了一些笔记。可行吗?不容我犹豫,这帮酒友便起哄架秧子,或是本着看热闹的心态,异口同声怂恿我写一本特工小说。我借着酒劲和骨头里的“二”劲,就答应下来了。于是,酒醒了就开始整理资料。

一年多的时间,素材整理差不多了,可是怎么写呢?首先是语言问题,按老套子写?小说,这个本来受大众喜欢的文学样式,近年越来越不招人待见,那些废寝忘食的读者都哪儿去了呢?不能骂读者都在新技术面前忘恩负义,往深里说,不是手机的问题,是我们小说家自己把读者写跑了。

往前将将,2005年间,我在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今晚报》等报刊上开过一段时间专栏,借鉴传统的“评书”形式,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。这反映了一个信号:那种语言形式,读者喜欢看。也就是说,那种样式比较招人待见。有人出主意,那你就照这个“评书”形式来写吧。还是本着听人劝吃饱饭的原则,《大舞台》就照着这个路数写了。可我还是没底,于是就有了小说后记中的感慨:“此书构思多年,今日(2011年3月23日)动笔,大概要经历数载才能完稿。体裁名曰小说,查阅素材,实为三分史料;三分演义;三分坊间传说;一分作者批注。如此风马牛纠结于一体,尚无前人写作经验借鉴,作者率尔操觚,功力不逮,必是行文困涩。想来,全书无贯穿始终的男女主角,也无传统套路的主线复线;人物诸多蜂拥而至,必定冗杂却不得剪裁;情节细碎摩肩接踵,当然繁密而难能简化。作者既无披阅十载之力,也无增删五次之能。一路盲人瞎马,随心所欲地写下去,布局必有失当,谋篇当然粗陋。脱稿之日,读者不吝批评。”这实在是我当时动笔时的真实心态。

形式就这样了,计划3年写完,结果爹娘先后住院,时间就不够用了,每天挤出些睡觉的时间,匆匆赶着写。人生很多时候,很无奈。回顾这些年,我总是处于一种匆匆忙忙地赶路的状态。从没能真正静下心来完成一部书。写作或如厨子烹调,根据食材,完成作品。此书原来掌握的材料不少,原谋划写到底完稿,因了编辑催得紧,只好作罢。一些材料只能割舍了,草草收场。本想精心做一道高端上档次的“佛跳墙”,却因许多材料没能用上,将就做成了“坛烧八味”。

作家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。当我们以文学的名义仰视作家的时候,别忘了作家的这个名号也许只是一个副产品。中国历代的文学经典,也不是现代意义的所谓职业作家写出来的。有一年,在北京,来访的欧洲某国学者告诉我:“好作家是可以成为社会代言人的,但在你们有些作家的嘴里,谈文学天乱坠,谈到社会就语无伦次,好像作家与社会无关似的。”我当即搬出了秦岭。那天下午,大家在感受了秦岭的《杀威棒》和《摸蛋的男孩》之后,立即与秦岭一起进入了深层次的社会话题。最终的结论顺理成章地由社会回归到了文学:秦岭,是个懂小说的中国作家。

秦岭还有可贵的一点,就是能够像直面社会一样直面自己,他不断地在检讨自己,否定过去,常常为浪费题材或写坏某部小说而痛心疾首。我认为,这是成熟作家的良好心态。对一个时时不忘反思历史的作家来说,只有先反思自己,写作的账目就不会糊涂。在这一点上,秦岭是明智的。

秦岭在走属于自己的路,而且越走越远了。我对他的关注,不会改变。

■看小说

王祥夫《户外活动者》 乞力马扎罗的石头

王祥夫深谙短篇小说的“留白艺术”,他的文字洗练精准、含蓄蕴藉,在近乎白描的冷静笔调之下,呈现出芸芸众生复杂微妙的心灵图景。

在短篇小说《户外活动者》(《人民文学》2015年第7期)中,乔志和安小兰因狂热的户外活动而相识并结婚。在朋友们眼中,乔志是大家的偶像、是英雄,因为他是他们当中惟一登上过乞力马扎罗山的人。乔志从那座非洲雪山上给安小兰带回了两粒樱桃大小的石头,看上去粗粝、丑陋,最普通不过,做成耳环后,“乞力马扎罗最高点的两块石头”就戴在了安小兰的耳朵上,“她的耳边立刻充满了高山之巅的风声”,这是多么不同凡响!他们仿佛一起看见了海明威笔下那只神奇的“风干的豹子”。

可是,在他们的儿子“小乔志”出生后的4年里,乔志终止了外出,发福、发呆之余没有任何事让他产生兴趣。有一天,他终于背上行囊离开了家,“从此安小兰和小乔志就没有见过他”,彼此只在网上联络。安小兰知道乔志一直保持着拍照片和写日志的习惯,若干年后他也许会“出版许多本书,挣到不少钱”,但是乔志并不看重这些,“重要的是他走过了,并且记下了”——他的行走不只是外面世界的招引,还出于对耽于物质的庸常人生的无声抗拒。在乔志几乎失联3年多之后,安小兰请来他们的朋友,在户外为小乔志的7岁生日举办野餐会。行为艺术家朱天雷带来的生日礼物是一个巨大的箱子,除去花花绿绿的包装纸之后,“又黑又瘦”但“眼睛那么亮”的、活生生的乔志从箱子里走了出来……这是一个“意料之外”、甚至也不在“情理之中”的结尾,足以令人震撼。生活中不乏这样看似行为古怪的人,他们被某种神秘而又坚定的意志所召唤,怀抱梦想、“一意孤行”,拓展着自己人生和生命的边界。

(刘凤阳)

■评 论

我读小说会谨慎选择,不光因为时间和精力。我看重优秀小说传递的文学精神、社会价值和反思方式。这些比小说技术更要来得不易,也是不能轻易学来的。中外经典小说的经验提醒我们,好小说好在哪里。

6年前在中国作协召开的秦岭小说研讨会上,有人认为秦岭小说的贡献首先在于提供了许多有认识价值的元素,这是个不低的评价,仅这一点,已经说明了秦岭小说的品质。大约在10年前,我曾经给秦岭的小说集《绣花鞋垫》写过序,吸引我的是小说中那种既新鲜又沧桑的异质气息。我所指的新鲜,是因为他切入问题的方式与众不同;我所指的沧桑,是因为小说里有对历史和世事的洞察。秦岭这个年轻人非常清醒,清醒到他中学时期的文章早早就被选入小学课本依然不惊人。他明白自己该与中外小说的经验和方法比照什么,同时又不会被某一阶段的流行和媚俗所左右,他善于用历史眼光判断现实,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中国乡村的感受,他笔下的乡村与与历史、民族、社会、文化的关联性而笼罩着一种精神气象。近年来,他出版了长篇小说《皇粮钟》等几本书,发表了《借命时代的家乡》《杀威棒》《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》《奔袭》等一批有影响的短中短篇小说。他稳中求变,又有坚守。说秦岭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思想型小说家,我认为是有道理的。

读《杀威棒》和《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》,我发现秦岭已经不是10年前的那个秦岭了,他思想飞翔的半径以及考察世事的范围迂远了許多,技术和语言也愈发变得圆熟